

<<我的父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父母>>

13位ISBN编号：9787208094932

10位ISBN编号：7208094934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倪培民

页数：2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我的父母&gt;&gt;

## 前言

光阴如梭。

曾经对我呵护有加的倪复生（倪福生）伯伯和江怡（范梦青）阿姨已经离开多年了。

如今，连我自己的孩子也已越过了需要大人呵护的年龄。

然而打开培民《我的父母》的手稿，随着一个个从小耳熟能详的姓名映入眼帘，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似乎顿时出现在我的身边。

“文革”后期替父母“平反”的奔忙之中，我曾经多次探访与这些名字连在一起的长辈，接受他们的关爱和帮助，那岁寒之后遇和煦春风般的时光永生难忘。

1979年，趁着“文革”中接受“审查”时被“翻淘”起来的记忆尚还清晰，两名曾经的中共上海电话局地下党党员——倪复生和江怡夫妇，决定把他们一生的经历记下来，传下去。

他们向儿子倪培民一次次地口述自己的回忆，还多次约来老同事、老朋友一起核对和补充事实。

本书就是倪培民根据当时记录整理的他父母1950年以前生活的传记。

两位传主出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们的父母是上海早年来自浙江和广东的“移民”，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工人。

江怡的父亲和叔父，曾是1925年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22岁的倪复生和14岁的江怡，先后考进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成为接线员。

当时，倪复生已经在寻找抗日门路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很快便担当起了在公司里重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任。

而为求生计虚报4岁才得到饭碗的江怡，纯朴正直、上进心强，很自然地接近并加入了地下党。

倪、江在并肩工作中建立起感情，结为伴侣。

十载荏苒，他们和地下党战友一起，宣传抗日，发动捐款；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与资本家斗争；演出话剧、出版刊物、举办活动，团结教育群众。

在白色恐怖中生活、工作，他们几度出生入死，命悬一线。

1947年10月，倪、江奉命撤退到解放区。

1949年解放全国期间，他们参与了北平和天津邮电系统的接管工作；江怡还被派往欧洲参加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

解放后，倪、江回到上海，年轻的地下党员从此成为新上海建设的领导者。

倪复生和江怡嘱儿子记下这一切当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而更是要给社会留下一篇信史，一篇有血有肉、有情有意，别具一格的信史。

由于记下的都是两位传主亲身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书中所叙史实有一般史料中难以见到的丰富真实的细节。

比如当时在电话工人中引起关注的倪复生被日本人逮捕事件：倪因自己的疏忽而和暗号纸一起意外落入敌掌时的痛悔，关在宪兵队当夜巧用电话把消息通知党组织后的释然，57个日日夜夜里所经受的种种酷刑，靠坚强和机智与敌人多次有惊无险的周旋，出狱后将“福生”更名“复生”那一刻的百感交集，都一一跃然纸上。

又如抗战胜利前夕江怡和地下党战友在电话局大楼散发《新四军贺年卡》事件：趁凌晨夜班中的休息时间，两个“小姑娘”溜出休息室，来到大楼一层层空寂的走廊里，轻轻地用脚尖将“贺年卡”从门缝底下拨进每一个房间。

第二天早上，前来上班的日本人发现了“贺年卡”立即动手组织搜捕。

而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江怡对此浑然不觉，还提着装有剩余贺卡的提包，在下楼的途中发掉了最后几张，幸运地在敌人关门搜捕的前一刹那离开了公司……类似的例子书中俯拾即是。

这些细节在透露出当时上海电话局地下党人勇敢、坚定，在成功和挫败交织着的历练中从单纯幼稚走向成熟老练的风貌，以及他们当时身处的真实环境，是我们从其他仅作事实陈述的史料中无法体会到的。

倪复生和江怡显然从一开始就决定以他们的“个人传记”为基础，托起一座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

## &lt;&lt;我的父母&gt;&gt;

的“群像”。

他们尽搜记忆，列举出上百个真名实姓的人物。

书中记录的活动之参与者既有刘宁一、李立三等共产党高级干部，更有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和普通党员。

倪、江特别留意记下那些在革命潮流中仅仅得以短暂存在的人物。

倪复生的政治启蒙人陈君博只是一名共青团员，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组织关系，却执著地坚持“从报纸上、书上寻找党的指示，确定自己的活动方向”。

陈引导倪认识了共产党以后，有事回了广东老家从此杳无音信。

倪的入党介绍人李小里、江的政治启蒙人陈伟和林海伦，都不久便失去了联系，多年后辗转打听到的，竟是他们牺牲了的消息。

“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有多少人就默默无闻地死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他（她）们不知葬身在哪一棵树下，哪一块石边了，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

”这本书里不仅记下了许多类似人物的名字，还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当时的举止言行，即使只有一场对话抑或几十个字的描写，都因着真情的回忆而使那些光彩的生命瞬间永远定格下来。

倪、江、电话公司地下党主要的直接领导钱正心，战友陆文达、郑少如、刘丽芳（刘励方，我母亲）、卢双文、方秀云、何馥麟、吴宝琳、苏湮池（马四方，我父亲）、陈启瑞、吴炯明……还有许许多多进步群众和积极分子，更都是这本传记的“共同传主”。

他们大多和当时的倪、江一样，曲身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或接近共产党。

中共地下党除当今影视节目中常见的“情报系统”，还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等系统。

电话局地下党属于后者，其主要的工作，是团结和教育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国民党斗争。

电话公司的这批青年工人之所以被共产党所吸引，甚至愿意为其献身，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的事业是为穷人、为社会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事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度过了他们传奇般的青春。

国难当头之日，他们选择挺身而出；忠孝难全之时，他们选择精忠报国。

他们所忠予的，正是流淌在我们民族血液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觉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如今他们虽然多已作古，却将因为本书而得以更长久地活在后代的心里。

本书的作者倪培民继承了先辈的责任感和情怀。

身为美国大学的一个全职哲学教授，用业余时间倾力把几十年前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所花的心力、心血，非他人能够想象。

过去，书是要“传世”的，书应该要活得比作者更长。

现在，由于文字普及、出版便捷等原因，这种传统正遭到颠覆，许多人编书、“做”书、只为当下的一次性消费。

“新生事物”固然不可厚非，但是也总需要有一些人把传统继承下去。

据我理解，培民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两层。

一是为倪伯伯江阿姨立传，留给家族的后人，这是“尽孝”。

二是通过为父母立传而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立传，留给世人，这是“尽大孝”。

二者都可敬、可佩。

本书出版，倪伯伯江阿姨和他们已故的战友们，当九泉含笑，他们那些依然健在的战友们，更当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忍不住还想添几句“多余的话”，说出自己对培民写作的一点偏爱。

在为父母和他们的战友记下这段信史的同时，培民还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一带社会风情的长卷。

展读“画卷”我们看到：那所为同乡子弟办的“广肇义学”里，学童们摇头晃脑地大声背诵着“小猫三只四只”和《总理遗嘱》；羊肠般的小巷深处，一幢老式砖木结构房子的客堂背后，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长长的照片，那是房间的男主人和工友们在参加五卅运动失败后的合影；日本宪兵队电刑刑具

## &lt;&lt;我的父母&gt;&gt;

旁，良心未泯的中国翻译趁人不注意，突然做出两个手腕交叉的动作，把减轻痛苦的方法暗示受刑人；一座纸醉金迷的舞厅里，放着软绵绵的音乐，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舞厅楼上，几个青年静静地坐在那里读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小年夜傍晚的静安寺写路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人群中穿行着专偷拎包的小“瘪三”；长江水道上航行着桨划纤拉的小船，一位生意人横卧在小船内仓，着一身绸衫裤、戴一副茶色镜，手摇折扇，悠悠地盘算着卖给苏中解放区的那批西药的利润……是啊，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但并不清澈。

就连本书中这些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竟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然而，“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就是有一种精神，一种气节，贯穿始终。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倪复生在狱中默诵过无数遍的诗句。

上海电话局地下党党员们当然知道自己未必能够像文天祥那样名垂千古。

然而他们从文天祥那里继承的一片丹心，却一定还会世代地传下去。

## <<我的父母>>

### 内容概要

他从一个酒店的拉门小郎和跑堂，成长为中共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的核心人物和工运领袖。

他曾在白色恐怖下与战友们一起发动和组织职工与敌人较量。

他在日本宪兵队里遭受过酷刑，九死一生，凭意志和智慧保护了党和同志的安全。

他也曾作为工人代表，在西苑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迁入北京，并随军南下，参加接管北京和上海。

..... 她是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范家的后代，却因贫穷而只读了三年小学，十四岁就开始做工养家。

她曾担任地下党女支部书记，勇敢机智地与各种敌对势力交锋。

她也曾忍痛抛下寡母幼弟和刚出生的孩子，撤出夜色沉沉的上海，然后又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前往苏联及东欧各国，在克里姆林宫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 他们是两个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那翻天覆地的革命大潮里，这两朵浪花的故事，也足以映照出一部催人泪下的史诗！

## <<我的父母>>

### 作者简介

倪培民，1954年生，本书主人公倪复生和江怡之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受到迫害，从为父母抄写“交代”、“申诉”而开始对人生、社会感到疑惑，初以文学和书法排遣兴情，进而走上哲学之路。

“文革”后从上钢一厂考入大学，先后获复旦大学哲学学士、硕士，美国康奈迪克大学哲学博士。

现任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及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和交流。

著有《孔子：人可弘道》等若干中英文哲学著作，个人书法集《笔墨哲思游》及五十余篇哲学论文。

曾先后担任夏威夷大学及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并曾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邀在世界公众论坛“文明对话”等国际会议上作主旨演讲。

<<我的父母>>

书籍目录

代序前言第一章 投身革命第二章 扎根群众第三章 严峻考验第四章 不让须眉第五章 地火运行第六章 工会斗争第七章 临危不惧第八章 安全撤退第九章 六次劳大第十章 迎接胜利后记附录1 大事年表附录2 战友名录历史照片

## &lt;&lt;我的父母&gt;&gt;

## 章节摘录

倪复生的祖籍应该算是浙江镇海，可是他从来不知道在镇海有什么亲戚。听说他的父亲倪慧扬小时候受不了族长的欺凌，打断了族长老爷的腿骨，只身逃古镇海，来到上海，到处打短工。

后来，终于在英商会德丰拖驳船洋行找到了一份差事，安下身来。倪慧扬生性倔强，不爱说话。干起活来，是乌龟掬在门板上——“硬碰硬”，没日没夜地干。为了保住“饭碗”，他又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语），所以被逐渐提升，若干年后当上了拖驳船队的“老轨”——总轮机长。这个职位不仅给他带来了一份较为优厚的工资，还不时地可以得到一些“外快”，于是，他在岳州路租了块地，造起了木板房，娶了妻，生下二男一女，日子过得还不算坏。

1916年，总轮机长又娶了个小老婆邝惠莲。1917年的农历5月22日（公历7月10日），邝惠莲生了个儿子，就是倪复生，小名“毛陀”。

倪复生出生的这个年头，正是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席卷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一页崭新的历史，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翻开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流入了中国这一麻木的泥足巨人的身躯。古老的中国，开始苏醒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席卷着中华大地。童年时代的倪复生并不了解这一切。虽然他也曾和小朋友们一起扛着木棍，排着队伍，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在小巷里游行，但这支歌对他来说只是一首容易上口的儿歌而已。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在他的头脑里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只是无形中对他的一生起着重大的影响。

一般的人回忆起童年时，都会想到母爱和父爱的温暖，可是倪福生回忆起童年时，却只能惨淡地一笑：“我对母爱和父爱缺少体会。”

由于外室的地位，他母亲在生了毛陀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和他父亲住在一起。总轮机长每个月只给他们一些微薄的生活费，每周来一、二次，有时看看就走了。邝惠莲是广东人，生就一个急躁的脾气，受不了这种冷落，经常跟丈夫吵吵闹闹，可经济大权毕竟在丈夫手里，所以最终只好拿儿子出气。

“你这个小浮尸！”

每当不顺心时，母亲就这样称呼他。也许是遗传的吧，毛陀也天生一副犟脾气，宁愿挨上一顿打骂，一副广东血统特有的炯炯大眼也从来不肯讨饶。

不过，母亲打他也不全是没道理的。他记得很清楚，6岁那年，有一次外公病了，母亲拿出6个铜板，叫他去买些金银花送去。他跑到半路上，给卖棉花糖的吸引住了。仗着外公对他的宠爱，他用6个铜板换了棉花糖。回到家里，撒了个谎，只说已经买了金银花送去了。没想到几天后母亲见到外公问起他吃了金银花后感觉怎样，外公给问得莫名其妙。结果回到家里，他被吊在床梁上，着实吃了一顿“生活”（挨了一顿打）。

8岁了，该读书了，可这么少的生活费，供养他上学有困难。他舅舅来了，说有个“广肇义学”，是广东人开的，专收广东同乡子弟，不要学费。倪复生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可是广东人没有姓倪的，于是他就跟着母亲姓了邝。

取了个官名，叫邝福生，报考了这个学校。

## &lt;&lt;我的父母&gt;&gt;

所以，他儿时的有些小伙伴（比如后来成了著名话剧演员的乔奇，就是他小学里同班的同学），并不知道他姓倪，只知道他姓邝，邝福生，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21岁。

广肇义学与老式的私塾不同，已经带有一点新式的色彩。

学生从小猫三只四只读起，也学点英语。

每个星期一早上，全体学生面对国民党党旗，背诵“总理遗嘱”，不管懂不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眼睛一闭，唧唧哇哇地背诵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背完总理遗嘱，还要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然后是校长训话。

学校的老师管得很严，动辄打骂学生。

福生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坏，可有时也免不了被老师的藤条抽得手心红肿。

学校离家很远，他每天早上做完家务，就去上学了。

带着12个铜板，可买一碗阳春面，作为午餐。

放学回家，就背起弟弟，用广东背孩子用的布背兜在胸前一扎，腾出两个手做晚饭。

这时候，他母亲一般是在邻居家打麻将。

自从生了他以后，母亲又先后生了12个孩子，可是最终只活下来4个。

他回忆说：“当时白喉病流行，好几个弟妹都死于这个病，家里常常一口口小白皮棺材抬出去。

记得我的弟弟承基（原名福基）生下来的那一天，刚刚死了一个弟弟，小尸体还躺在家里。

我舅舅一个星期里面死掉三个孩子，都是死于白喉。

妈妈心里当然不好受，怪来怪去，又怪到我头上。

‘都是你！

你这个老大属蛇，弟弟妹妹都叫你这条毒蛇咬死了。

‘弟弟承基属虎，妈妈说，‘不行，将来你们两个在一起龙虎相斗，他又要给你咬死的！

‘就这样，承基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一家姓周的去抚养。

后来，因为没有女儿，母亲就领了个小姑娘，那就是我的干妹倪福珍。

” 在学校有严师管束，在家里又得不到母亲的慈爱，使他养成了一种孤僻的性格。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结束后，他们搬到了岳州路，和他父亲住在一起。

在那里，大母所生的几个兄弟都看不起他，粗活重活都叫他干。

每天清早起来，就要劈一大堆柴，然后给弟妹洗尿布、烧早饭。

这种生活，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滋长起一股反抗的力量。

“一定要争口气！

”他学会了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

宁肯吃苦，受委屈，也不求人。

只有晚上，当他独自一人躲进自己的小阁楼时，他才感到有了自由的天地。

这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小阁楼靠着正房背面，门开在地板上，从后院的一个活动小梯子爬上去，托起阁楼地板就可以出入了。

抽掉梯子，根本看不出上面有个小房间。

阁楼有两扇窗，一扇就面临后院。

院子里有两个原屋主的坟堆，还有两棵并立的大树。

他在树上搁了一根铁条，作为单杠。

另一扇窗外面是一片屋顶。

这里的每片瓦片下面都是他藏东西的地方。

后院还有一个边门可通到隔壁一家小工厂。

他常在晚上从这小门里不声不响地溜出去找小朋友们打乒乓球玩，一直玩到很晚，才又悄悄地从这小门里溜回。

这些“偷”来的娱乐，在他苦恼的生活中，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因此，尽管这个阁楼很窄小，隔壁那家小工厂的马达声日夜轰闹，震得楼板都颤动，又是冬凉夏暖，夏天蚊子满身乱咬，冬天雪花纷纷扬扬飘进屋来，可他还是喜欢它。

这里没有兄弟姐妹们的歧视，也没有父母的斥骂，这是一小片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天地。

## &lt;&lt;我的父母&gt;&gt;

1931年8月，老轮机长失业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15岁的福生不得不辍学，自己谋生了。

记不起是谁介绍的，他进了一个洗染店当学徒。

白天用粗大的板刷刷衣服，整天地刷，肥皂水浸得双手发了白，几天下来，手臂酸得抬都抬不起了。

晚上，老板就让他睡在柜台底下，随便抓点东西盖盖。

做了两个月，人瘦了，两条大腿长满了癞疥疮，眼眶陷得深深的。

他舅舅看不过去，说：“别干了，先跟我到码头上跑腿去吧，以后再另找个好一点的生意（工作）。”

他舅舅邝惠振，在大英轮船公司当报关员。

福生跟着他跑跑腿，到海关、商品检验站等处核对、盖戳，在码头上收收筹码，每个星期从舅舅那里拿六角钱零用。

这已经比在洗染店当学徒强多了。

就用这六角钱，他买了些书本杂志，继续自学文化。

可是，一直靠舅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想到这个，他心里自然十分焦急，所以，他常常独自跑到大陆商场图书馆（即后来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去看报纸上的招聘栏。

1934年10月份的一天，岳州路131号（即今129弄2号）来了一封印有“新亚大酒店”红字的信，信封上赫然写着“邝福生先生”的字样。

他妈妈拿到这封信，始则一愣，继则破口大骂：“小浮尸！

滚出来！

你在外面吃了饭，欠了债，人家讨债来了！

福生给骂得莫明其妙，拿过信来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妈，不是讨债，是我考进了！”

原来，他偶尔在大陆商场的招聘栏里看到新亚酒店招收boy（侍员）的启示，启示上写明，凡具小学文化水平，会简单英语会话及广东话、上海话、国语对白（即普通话），且眉目端正者，均可报考。

福生自忖条件适当，试了一下，想不到果然录取了。

他喜孜孜拿着贴子来到新亚酒店，当上了拉门小郎——专门在大门口给客人拉门的boy。

以后，又先后调到西餐间、中餐间，最后调到楼上侍候包厢，照现在的说法，也算是个“上手”了吧。

直到晚年，他还可以稳稳当当地一手托上一个盘子，一手抓起五个杯子，逢年过节时偶尔给子女们露一手。

差事（工作）变了，薪水略多了一些，福生在家里的地位也上升了，长兄们不敢随意欺侮他了。他自己更是处处好胜，要在家里争口气。

那年他大母死了（1937年春），父亲把他和大母所生的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现在我失业了，这个丧事你们兄弟几个包下来。

各人出多少钱，自己报。

福生没有多加思索，咬咬牙，拍拍胸脯说：“我出一百块大洋！”

两个异母兄弟一听，傻了眼了，只得硬着头皮也报了一百。

后来事实上他们两个都是靠变卖家里的财产来交差的。

只有福生，到酒店里借了一百元，在工资里扣了好几个月才还清了债务。

但是从此以后，那两个兄弟再不敢小看他了。

.....

<<我的父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